

当前位置: [网站首页](#) > [学者风采](#) > [作品选录](#)

## 语言的殖民地

【作者】董炳月

毛丹青的《旅日中国学者的双语困惑》[i]（以下简称《双语困惑》）一文，触发了笔者对“用外语写作”这一文化现象的思考。不言而喻，这思考中积淀着笔者作为一位留日中国人的个人体验，但这种个人体验应当具有普遍性。

### 一 留日者的尴尬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1896年，中国人开始留学日本。这意味着留学伊始，中国留学生们就必须作为战败国的子民，承受日本人带有侮辱性的、居高临下的目光。因此，早期留日学生去上野公园游玩，也会有日本儿童追着喊“猪尾奴”[ii]。这种对中国人的蔑视通过新闻媒体表达出来，成为来自日本知识界的声音，于是，陈天华在1905年12月8日为抗议日本人的侮辱、为警醒国人而蹈海自杀。


大约是因为这个头开得太“晦气”，所以自此以后，中国留日学生的际遇与命运实在让人“不知说什么好”。姑举几例。向愷然，清末民初两次留学日本，结果在其开中国留学生文学先河的长篇巨著《留东外史》中，将日本骂作“卖淫国”，将日本人称作“日本小鬼儿”。日本入侵中国后，他给自己家养的一条狗取名“甲板”（Japan），不仅自己投身抗日战争，并且送儿子去当空军，要和儿子一起在空中、地面与日本人进行“立体作战”[iii]。几乎与向愷然同时留学日本的周作人，娶日本女性为妻，热心向中国介绍日本文化，几乎成为中国第一知日文人，结果是日本人使他不清不白地成了“汉奸”。郭沫若，留学日本并与护士小姐佐藤富子结婚生子，结果卢沟桥枪声一响，他投笔请缨，别妇抛雏，穿着睡衣从市川的住所逃出，回国抗日去了。郁达夫，留学日本，在日本写出名作《沉沦》，颇受日人敬重，但在抗战开始不久，他却写出了《日本的娼妇与文士》[iv]那样尖刻、激烈的文章。抗战胜利时他远在南洋的苏门答腊，却未能逃脱日本的魔掌，他被日本兵按在地上活活掐死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天才作家的双脚该是如何痛苦地抽搐……。留日中国人与日本的关系实在不应当是这个样子，但又确实确实是这个样子。


上面这些事实，应当能够提醒我们注意不同时代留日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话语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双语困惑》一文提及的《日本经济新闻》上的文章，指出了鲁迅、郭沫若那一代留日中国人与新时期旅日中国人的区别：“前者用中文表达，后者用日语撰稿”云云。


《双语困惑》的作者毛丹青对“日语撰稿”之“潜台词”的阅读是敏锐的，但似乎还有更值得注意的问题没有被读出来，那就是语言的选择对价值观的影响。


### 二 说给谁听与说什么


人的本质是语言，因此可以把“人”定义为“语言的动物”。语言作为一种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塑造着人这种动物的每个方面。日本人在对台湾和旧满洲实行殖民统治期间运用各种手段推广日语，甚至把日语定为“满洲国”的国语，实在是颇具“历史眼光”的文化阴谋。在这个意义上，母语就是“自我”，用母语进行表达是人作为人的最大自由。而且，母语无法逃避，试图逃避母语就像试图在阳光下逃避自己的影子。如果你明明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


 收藏文章

 打印文章

 关闭本页

 发表评论

 阅读量[434]

 评论数[0]

下”、普通话说得很标准，但你为了表示自己的“东洋化”或“西洋化”或“南洋化”，而刻意把汉语说得结结巴巴，那么你“一不小心”就会把汉语说得很地道。

既然如此，选择用外语来表达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对语言自由的放弃，意味着话语权的被剥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放弃语言的自由、用外语来表达，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因为对方不懂叙述者的语言，而叙述者为了表达自己，只有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语言。比如中国政府在召开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自配英文翻译，让不太熟悉汉语的各国记者领会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就属于这一种。另一目的是对倾听者有所期待、试图在倾听者那里实现自己的价值，所以只有用对方的语言来表达。比如一个离开中国来到欧美或日本的中国人，为了获得这个陌生世界的承认，便只有使用这个社会共有的语言。于是，英语或是日语就成为其进入欧美社会或日本社会的第一条通道。所以，当某些旅日中国人为在日华人的日文著述而“自豪”的时候，毛丹青尖锐地指出：“他们用日文著书大部分是为了满足日本的舆论要求，别无更深的理由”，确实很有必要。

不过，为了在异国生存、实现自己的价值而用外语著述，这一文化行为还潜藏着更大的危险性，这就是价值观之独立性的丧失。为了获得对方的承认而使用对方的语言，也不免屈从甚至迎合对方的价值观与趣味，叙述者价值观之独立性由此受到威胁。当叙述者价值观之独立性丧失殆尽的时候，写作便会流于“文化的谄媚”。

叙述者在这种“外语写作活动”中的“自我”变异与对倾听者的谄媚，首先表现在旅欧旅美华人的英文著述中。在大陆引起反响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v]一书中，作者尖锐地批评了郑念的《上海生与死》、张戎的《鸿》等华人英文畅销书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妖魔化》——比“丑化”更可怕的“妖魔化”。该书指出：

这些写给美国读者看的书，必须要照顾到根本没有经受过“文革”苦难的美国人的趣味。换句话说，就是要把那么多的苦难和悲伤，写成能够赚取美国读者同情的眼泪和好奇心的感人故事。结束时，更要让读者感受到一点，就是“还是生活在美国幸运，美国是多伟大啊”。

实际上，那种对西方社会近于自轻自贱的谄媚，正是以“用英文写作”这个事实为前提和起点的。他们的“话语王国”沦为英语殖民地，他们在成为“英语”的“顺民”的同时，亦成为英语社会价值体系的屈服者。

那么，这种“外语写作活动”中叙述者的“自我变异”，在旅日中国人的日文著述中是否存在？答案是肯定的。《双语困惑》一文提及的199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某旅日中国人博士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所谓《中国也要自省》的文章就是一例。中国当然要反省，而且这种反省多年来一直持续着。搞四个现代化，甚至搞核试验，可以说都是基于这种反省、基于对“落后就要挨打”这一惨痛历史教训的汲取。但是，这种“反省”决不是作为曾经给亚洲社会带来巨大灾难的日本所应当作的那种“反省”。在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作者将这两种反省相提并论，无疑是混淆了作为“反省”之前提的完全不同的历史事实（加害与被害），并且回避了历史判断中的道德判断。如果我们注意到这篇文章是用日文写作、而且是发表在《朝日新闻》这种在日本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报纸上，那么作者的写作动机就一目了然。毛丹青将其解释为“并无恶意，只希望中国能够自强”，未免流于简单与善良，因为那篇文章并不是写给使用汉语的中国人看的。

比某博士的文章更应引起注意的，是沈洁博士的《“满洲国”社会事业史》。该书是著者的博士论文，1996年由京都的ミネルヴァ书房出版后，引起日中两国学界的反响。1996年10月27日，著者在东京的巢鸭社会教育会馆作了题为“《“满洲国”社会事业史》写作出版经过”的演讲。著者说：“我把在‘满洲国’实施的殖民地社会事业区分为文化性社会事业和政治性社会事业，从文化性社会事业的角度给民间层次或者个人层次的救济活动给予适当评价。我觉得在至今尚未解决的殖民地问题、日中战争问题中缺乏实证的、冷静的态度，没有不仅追究过去的历史责任、而且面向未来的新观点；”“究竟应当怎样把握历史实象？生活在‘满洲国’的人们的真象是怎样的？很久以来我苦于对这些问题的反复思索中。”这里无暇介绍那本厚三百余页的专著，但读者从著者的上述自白中，大致可以了解那本书的内容。著者确实认真地考察了日本殖民主义者在“满洲国”实施的社会事业。据著者说，已经有人批评该书是美化日本殖民主义的侵略行为[vi]。笔者深有同感。因为书中关于日本在“满洲国”实施医疗卫

生事业等等的介绍，使笔者想起了1995年10月日本前总务厅长官江藤隆美的发言——所谓“日本在统治韩国期间为韩国建了釜山港、仁川港和五千多所学校”。但由于韩国人的强烈抗议，江藤被迫辞职[vii]。

笔者的专业并非历史学，亦非社会福利事业史，但从历史常识出发，笔者认为有两个与《“满洲国”社会事业史》的逻辑起点密切相关的前提性问题应当讨论。第一，对于当年生活在“满洲国”的中国人来说，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存在过正面意义上的“社会事业”？杨靖宇、731部队、万宝山事件等姑且不论，恰好在听了沈博士讲演一周后的11月3日，笔者在NHK（相当于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看到了介绍出生在旧满洲的日本名演员森繁久弥的专题节目：《遥远的青春之地》。从那个专题节目对曾经生活在“满洲国”的东北老人的采访中，我得知日本人在当年“满洲国”的地位最高（所谓“大太君”），朝鲜人次之（所谓“二太君”），中国人则最低。沈博士专著中的某些统计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有关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满洲国”对杀的惨剧，日本电视台也不止一次作过介绍。第二，在日本国的国民作为一个群体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时候——满洲开拓团的派遣本来是一种“国有行为”，“民间层次或者个人层次的救济活动”如何从国家的侵略行为中区别出来？意味着什么？历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寻找个别性而是寻找普遍性，把个人完全等同于国家或者把个人从国家中完全分离出来，同样是历史唯心主义。

著者自云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把长期来被中日两国研究者置之不顾的‘敏感’课题发掘出来，在对历史事实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解明”[viii]。但是，如果不是置身日本的社会环境，如果不是以日本人读者为对象而用日语写作，那么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大概是另一种情形[ix]。

问题依然是“日文撰稿”。

其实，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那一代留日中国人相比，当前留日中国人用日文著述，未必完全是喜剧——虽然也未必是悲剧。向愷大约不会用日文写《留东外史》，郁达夫大约不会用日文写《日本的娼妇与文士》，因为那样的话，他们便很难拥有自己的“读者”。这大概也是毛丹青所谓的“双语困境”之一种吧。

### 三 唱好“中国戏”

但是，对于毛丹青有关在日中国人大唱“中国戏”的批评，我却不以为然。相反，我认为在日中国人应当大唱中国戏，唱好中国戏。

对事物的认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自知”，二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他知”。不过，这两种“知”各有其局限性。因此，第三种“知”——“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知”，可算是真正的“知”。在中国出生、在中国生长、对“中国”有切身体验中国人，当他们走出中国并置身于新的社会环境与价值体系之中，然后再回首看中国，应当是“恍然大悟”或者“感慨良多”的。仅举一例。费孝通的名著《江村经济》，似乎就是著者留学时期在国外“唱中国戏”的成果。“研究”与“研究对象”并不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说完全是两回事。这是因为“研究”（社会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持某种价值观与“研究对象”进行对话。正是由于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持有其独自の价值观，他们的研究才对中国学者富有启发性。据笔者所知，在日本大学专攻中国学（历史、哲学、文学等）的中国留学生，常常受到日本人不友善的询问：“中国人为什么要到日本来学习中国学？”这无疑是由于询问者认识论上的幼稚。

从帮助日本人认识中国的角度看，在日中国人“唱中国戏”也是有必要的。在日本是否了解中国这一问题上，我与毛丹青的看法不同：日本未必了解中国。正像杰出的日本学者野村浩一指出的：“日本近代史是在认识中国这一问题上失败的历史，而且不能说这种历史已经结束。”[x]政治家关于战争问题的“失言”、钓鱼岛争端、遗留化学武器的处理、正在日本社会蔓延的对中国人的歧视与仇视[xi]，都不妨看作是这种“不了解”的表征。那么，谁来向日本传达中国？日本中国学会的约两千名会员正在辛勤地工作着（中国人应当感谢他们），但那永远是一种“日本人表达”，被表达的是一种“旁观者清”的“知”。而且，如果个别研究者对中国和中国人持有偏见，那么其偏见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只能加深日本人对中国的误解和蔑

视。比如有日本学者受美国人的影响而研究中国的人种歧视思想，把西藏解放称作“以‘解放’为名义的种族歧视”[xii]（按照这种逻辑，西藏解放前的农奴制将成为“人权制”）。因此，中国人在日本唱中国戏，“现身说法”，用日语向日本社会传达“中国”，就是有必要的关键依然是“双语困境”。如何在使用别人的语言时保持“自我”的完整性，不致让自己的话语形式成为外语（及使用这种语言的人们）的殖民地，进而把外语“工具化”，使外语成为自己支配的“殖民地”。……这些问题。实在值得深思。笔者有幸看到《留学生新闻》等华文报刊都设了日文专页，认真向日本传达着中国。这是可喜的现象。朱建荣先生在电视专题节目中用日语向日本人传达中国人对两岸关系等问题的认识，也是很有必要的。

当然，笔者并不反对甚至赞成毛丹青关于在日中国人应当唱“日本戏”的主张。正像日本人常说的：中国与日本是这样近又是这样远。大约是因为同样是黄面孔、同样使用汉字，这两个差异性很大的民族才那么容易误解对方吧。看似“同文同种”，其实性格各异。中国和日本太需要互相了解。但中国人如何在日本唱“日本戏”，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i] 毛丹青：《旅日中国学者的双语困惑》。《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7年6月号。

[ii] 实藤惠秀：《中国留学生史谈》。第一书房（东京）1981版。页57。

[iii] 向一学：《回忆父亲一生》。《江湖奇侠传》附录。岳麓书社（长沙）1986出版。

[iv] 郁达夫：《日本的娼妇与文士》。1938年5月14日《抗日文艺》第四期。

[v] 李希光等著：《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6出版。

[vi] 以上见讲演稿，原文为日文。载《日本侨报》，1996年12月1日，第五号。

[vii] 被迫辞职后的江藤隆美并不认错，并在1996年初的新年恳谈会上重申自己的观点。参见《江藤氏说：“没有必要的反省”》。文载1996年1月5日《朝日新闻》第12版。

[viii] 沈洁：《“满洲国”社会事业史》（京都ミネルヴァ书房，1996），页3。

[ix] 听讲演的时候笔者曾问讲演主持人段先生：“这本书是否已在大陆出版了中文版？”段先生说：“大陆恐怕不会出版这本书吧……”。这耐人寻味。

[x]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47页。研文出版（东京）1981版。

[xi] 据1997年夏天的一份调查，当时对中国怀有好感的日本人只有14%，与二十年前中日恢复邦交时的55%形成巨大反差。参见张一帆：《日本的“中国热”为何退潮——访众议院议员福田康夫》。《时报》（东京）1997年7月号。

[xii] 坂元ひろ子：《以“解放”为名的种族歧视》。《世界》（东京）1996年第3期。

【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6月号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西北大学文学院
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的	介绍	西北大学文学院肇端于1902年陕
前身是1953年建立的全国第一个	重庆三峡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创	西大学堂所设置之“中学门”与
文艺理论教研室。在著	建于1956年，已有50余年办学历	“西学门”辖属之“文
	史。现任院长谢建忠	

更多  
加盟  
信息

关于我们 | 联系方式 | 意见反馈 | 投稿指南 | 法律声明 | 招聘英才 | 欢迎加盟 | 软件下载

永久域名: [www.literature.org.cn](http://www.literature.org.cn) [www.literature.net.cn](http://www.literature.net.cn) E-Mail: [wenxue@cass.org.cn](mailto:wenxue@cass.org.cn)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